

會是如何由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交織凝結而成的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前言頁3）。這種問題意識，應該是戰後日本學者對中國社會的共同體問題關注的延續。若將其置於戰後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中，則可看出作者在商品生產與地主制、民眾鬥爭史、鄉紳統治論等研究基礎上的新解釋。所以，地域社會論與其說是一種闡釋歷史的新理論，不如說是將歷史現象置於具體的地域社會網絡中進行闡釋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當然，本書也有值得商榷的部份。如第五章論述公局出現的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地域開發成熟後，地方財政收入相對於行政事務增加的匱乏，而導致匱乏的重要原因，作者認為是清代的原額主義財政使增加賦稅變得困難。但事實上，清代的田賦收入在地方的留存額很少，地方財政自清初即處於匱乏狀態。地方收入主要來自火耗、陋規等非正式財政體系以及清末的厘金，原額主義更多的只是體現王朝的仁政，對於地方財政的影響並沒有作者所認為的那麼重要。另外一些論證略顯薄弱。如第三章第三節論述造反的原因時，作者認為這與胥吏對山區定居者的壓迫有關，並依據《雲陽涂氏族譜》提出胥吏更多為移民地主，最後推演出造反原因是移民地主與山區定居者之間的矛盾。此處僅以雲陽大姓涂氏為例論證胥吏更多為移民地主，似乎略顯單薄。儘管如此，本書仍不失為一項富有啟發性的探索，對中國移民史、地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鄭俊華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林滿紅，《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318頁。**

《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一書的初稿是林滿紅1989年提交給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底由哈佛大學出版了英文本，2011年分別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奉獻由作者深度參譯的中文本。作者強調有機的整體史，這使得她力圖打破學科和研究領域的人為分割，整合經濟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使得她不只是關注單一國家的分析，而是注重中國和世界的聯繫。此外，她還受到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關注經濟現象和行為背後的思想模式（頁15）。

本書主體為三大部份。上篇題為「全球聯結：白銀與世界」，共三章。第一章介紹了1808至1856年中國「銀貴錢賤」及其全國性衝擊的背景，即在16世紀賦役大量折銀之後，中國不是產銀大國，所需白銀的供給主要依賴外國，從16至17世紀的日本，到18至19世紀的拉美，獲得白銀的方式主要是絲、茶等的出口。不過，在白銀大量進入並流通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缺乏貨幣主權的概念，並沒有使白銀成為政府控制的鑄幣，而是維持稱量貨幣的自然狀態。因此，晉商的跨省金融網絡，促進了白銀在全國的使用，也使得政府在賦稅由銅錢兌換為白銀和匯兌白銀至京方面非常依賴錢莊。

第二章利用馬士、嚴中平、余捷瓊等的研究成果，美國商務部門的資料，英國國會文書，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官方報告等資料，繪製了19世紀前期（甚至更長時間）中國與印度，英國和美國的貿易收支，中國每年白銀外流的數值、白銀流入流出估計總值，中國的銀錢比價，鴉片每年進口到中國的數量、數值及貿易路線，中國茶、絲的出口數量與價值，世界金銀產量，共計表格15個，地圖、資料圖七張。這些統計圖表不僅盡量保持了時間上的連續性，也因牛津大學博士生王憲群的幫助，跨越英鎊與銀元之間的換算障礙，得以將外貿收支單位統一為銀元。在堅實龐大的資料統計的基礎上，作者試圖說明，19世紀初白銀外流的根本因素並非鴉片進口，而是世界金銀的減產以及中國茶、絲出口的嚴重衰落。如此，1808-1856年間中國出現的全國性的白銀大量外流（約為3.68億銀元，頁75）和銀貴錢賤（銀錢比價由1826年的1,300增為1846年的2,300，頁76）現象，在19世紀中期拉美白銀恢復供給，澳大利亞金礦發現，及英、美各國逐漸將貨幣體系改為金銀複本位制或金本位制，中國的茶、絲出口恢復並增長後，才得以緩解，並在即使鴉片進口遠高於前期的1857-1886年間，流入白銀6.91億銀元（頁85）。

第三章論述了銀貴錢賤危機在一個地區內及不同地區之間造成浩劫，且影響了各個階層。主要依賴銅錢為收入的工人、零售商和農民的收入降低；用銀繳納租稅的地主，和以銅錢為收入但用白銀繳納鹽稅的鹽商日益貧困化；主要以銅錢為報酬的士兵更加困窘；即使是領受白銀俸祿的官員，其收入也會因為他們經營土地和商業的收入下降而減少。在稅基和稅源受損的條件下，國家在賦稅各方面均出現稅收不足的情況，政府即使緊縮支出，依然不能阻止經常性的財政赤字。當白銀危機使民眾更加貧困時，官民愈發拜金。官員的腐敗和民眾的抗爭導致清朝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所幸1856-1886年間，白銀回流中國，協助化解了這個巨大的危機。

中篇為「經濟論證所憑藉的文化資源」。如果說在第三章作者把經濟史

融入了社會史，那麼在第四章作者則把經濟史帶入了思想史。關於如何應付銀貴錢賤危機，主要依靠國家還是市場，19世紀前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利用古代中國靈活的經濟思想傳統，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應對方案。作者從生員王塗及其所著《鈔幣芻言》切入，繼以各學者、官員對其著作的反應，闡述了貨幣權該由政府還是錢莊控制，是否該發行紙幣和銀幣，紙幣可否兌換白銀，發行量該為多少，面值大小應如何，銅錢是否可以替代白銀，如何處理銀錢比價的政府定價和市場定價等問題。19世紀前期的中國政府採取了放任派知識份子的建議，主要依靠市場自行運作貨幣流通。

在第五章作者比較了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思想史，認為19世紀前期中國的貨幣危機爭論中，西方經濟思想的影響微不足道，中國知識份子主要借助了頗具彈性的本國政治經濟思想傳統。與17世紀以前英國的經濟思想傳統相比，19世紀前期中國繼承的是政府較少干預的歷史傳統，而近代早期的英國，政府干預色彩相對濃厚。與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者相比，19世紀前期的中國學者們的財富觀更為豐富，認為財富不僅僅是貴重金屬，獲得貴金屬的途徑不僅僅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可結盟互惠，而非損人利己。與20世紀西方經濟理論相比，在關於貨幣權集中於中央政府還是交給市場自發調節方面19世紀前期學者們的針鋒相對，與凱恩斯主義和哈耶克思想的爭論非常類似。19世紀前期中國知識份子的貨幣思想背後的思維模式是什麼呢？他們對經濟思想的邏輯起點和假設追問到什麼程度呢？

下篇題為「不同學術觀點的競爭」，具有經世思想的學者從其所持貨幣經濟的觀點角度分為干預派和放任派，而19世紀前期學者集詩人、經學宗師等身份於一體，使得他們又屬於不同的文學、哲學派別。其貨幣經濟思想、派別與文學、哲學思想和派別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呢？第六章論述了干預派和放任派不同的經濟思想的邏輯起點和假設，即前者主張人性自私，應予以譴責和政府干預，後者主張人性自私乃自然之事，不必責難，政府干預越少越好。由此反映到社會關係上，干預派主張對商貿和貨幣施行嚴格限制，而放任派卻認為只有在個人惡行對社會公義造成嚴重損害時國家才插手。二者都主張強化國家在貨幣領域的權力，但放任派建議國家鑄幣以貴重金屬為原材料，反對國家發行無限量的紙幣竊取民眾財富。對比兩派的社會改革思想，干預派更為激進。

在第七章作者認為把19世紀前期的經世思想與今文經學聯繫在一起是不夠的，因為經世思想除了受到今文經學影響外，也受古文經學影響。作者先是分析經世學者政治經濟觀點的分歧，受到年齡、階層、種族或官位不同的

影響較小，而更多是受其所選擇的經學流派和文派的影響。經學流派有古文、今文經學派之分，前者內部又分為桐城派和陽湖派。因同繼承了方苞的法可隨義而變的思想，故兩派都主張變化。但因桐城派強調章法、篇法，而陽湖派強調音節和字句，故桐城派注重結構性變化，而陽湖派傾向於技術性變化。古文派強調忠誠，這與干預主義者的國家無限權力和桐城派的擬古主張相符合。陽湖派鼓勵個人創造詞句，與今文經學派強調個人主動性、私人企業和自由貿易相符合。

在第八章作者想說明，觀念也在詮釋社會現實。19世紀前期，隨着銀貴錢賤危機的惡化，放任派的思想崛起並成為佔支配地位的思潮，在礦政、海運南漕、票鹽方面得到體現。但隨着銀貴錢賤危機在19世紀中後期的舒緩，政府控制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而內亂和外國入侵則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所以干預取代了放任，並逐漸盛行。政府插手鹽業專賣、紡織、電報等行業，國家經濟利益得到強調，貨幣觀改變，政府開始大量鑄造銀元，銀兩本位制變為銀元本位制，國家銀行成立，對錢莊票號的管理也加強。

綜觀全書，銀錢比價尤其是19世紀前期的「銀貴錢賤」是作者研究的切入點，並成為一以貫之的主線。這條主線帶我們從經濟領域到社會、政治和思想領域，領略了那些令人震驚的變化，並觸及到世界經濟和中國王朝的衰落，經世思想和社會現實，以及「流產的資本主義」等重大議題。如果不是一位成熟的經濟史家，是不能做到的。

李義瓊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劉統霞，《被表述的民俗藝術——對商河鼓子秧歌的歷史人類學考察》，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205頁。**

對於民俗藝術的研究，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藝術工作者主要利用田野調查獲得的材料來建構其理論體系。不過，就理論和方法而言，民俗藝術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人類學學科體系的基礎上。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葉，西方人類學的研究對象聚焦於「他者的文化」。20世紀60年代以後，「他者的歷史」越來越多地受到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關注，成為他們進行創造性交流的場所（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編，賈士蘅譯，《他者的歷